

# 论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形象的塑造

华建新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余姚学院, 浙江 余姚 315400)

**摘要:**姚剧《王阳明》塑造了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真三不朽”的圣贤形象,王阳明一生为社稷和黎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并将三者有机地统一在“致良知”的人生境界中。姚剧《王阳明》全面地展示了主人公坎坷和美好的一生,性格鲜明,气势恢弘,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完人的形象,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和历史文化意义。

**关键词:**姚剧;《王阳明》;真三不朽;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7.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3-0012-06

王阳明(1472-1529)作为有明一代的心学大师,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作为戏曲形象的出现,最早要追溯到王阳明平南昌藩王朱宸濠叛乱后,由山阴道人编的南戏《王阳明平逆记》。此剧是根据王阳明弟子董澐之子董毅的笔记《斩蛟》改编,并将王阳明平朱宸濠叛乱的胜利归因于道士许真君的指点,王阳明则被塑造成神仙人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俗对王阳明平乱的看法。2007年底,浙江省余姚市艺术剧团推出了新编篇章体传记体历史剧《王阳明》(以下简称《王》剧),标志着王阳明的戏曲形象重新走上了戏台,进了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王》剧通过多种艺术手法,鲜明地刻画了王阳明正直、仁爱、执着的性格,艺术地再现了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贤理想、践行“致良知”的人生篇章。《王》剧在思想内涵上是按照“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展开故事情节,反映了当代人对王阳明人物形象的理解和把握。

—

戏曲作为综合性的叙事艺术,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的品德,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和审美作用。《王》剧是传记体历史剧,塑造血肉丰满的主人公形象是全剧的关键。戏曲塑造人物形象是通过外显的情节传达出人物的内在品德。从《王》剧的情节角度看,第一个层面是表

现王阳明的“德性”。剧中主要通过“抗疏救戴铣遭廷杖”和“厚葬娄妃”两个篇章来实现的。

“抗疏救戴铣遭廷杖”这场戏,其本事可见之于王阳明高足弟子钱德洪等所撰《王阳明年谱》、以及《明史·王守仁传》等历史文献记载。此戏的历史背景是明正德朝的“反阉党斗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明代惩罚百官的“廷杖”和“诏狱”制度。正德元年(1506),昏庸荒淫的武宗任用刘瑾为首的阉党,阉党把持朝政,祸国殃民,激起了朝中正直士大夫的义愤。以阁臣刘健、谢迁为首的忠良之士,迅速掀起一场“倒刘”运动;但武宗听信谗言,“倒刘”运动迅即失败。刘健、谢迁被迫致仕,朝野为之震动。南京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为挽刘健、谢迁留任,上奏反对刘瑾专权,而惨遭迫害,戴铣则被廷杖致死。在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下,与其说是阉党得道,倒不如说是对朝中百官“良知”的检验。此年冬,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在明知朝廷无道的情况下,出于正义,为营救戴铣等人,奋不顾身,首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疏入,激怒了刘瑾,王阳明被廷杖四十,几死复苏,后被投入诏狱。《王》剧根据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把主人公置于“廷杖”酷刑之中,以此检验其内心的“良知”。戏中,通过太监传旨导出历史背

收稿日期: 2012-01-04

作者简介: 华建新(1952-),男,浙江余姚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王阳明心学美学与明清文学。E-mail: zjyjhjx@126.com

景和案由，然后由王华、王阳明父子在刑场上对唱，抒发对残暴专制政治的愤慨之情：

王 华：儿呀！（唱）：四十杖，打得儿，血肉飞溅。

王阳明（唱）：四十杖，打得我，天崩地塌。

王 华（唱）：儿受刑，父疼痛，刀割剑刺。

王阳明（唱）：恨权奸，误社稷，比虎狼凶残。<sup>[1]</sup>

剧中，演员用滚地、甩发等一系列动作，表现出王阳明承受酷刑的剧痛，唱词抒发出对昏君奸臣的愤怒。当阳明父王华前来探视时，王华违心地斥责阳明不懂官场凶险，并警告阳明：“就你仗义执言？就你嫉恶如仇？你到京城才几年，你知道官场的凶险吗？如此以往，必有大难。”<sup>[2]</sup>尽管王阳明为自己的行为株连到父亲而感到内疚，但王阳明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喊出了“人是一定要讲真话的”肺腑之言。此言，实质上是棍棒下的控诉与抗议。在明王朝实行高压恐怖统治下，“讲真话”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点王阳明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正因为这种“讲真话”的性格，为昏君与阉党所不容，昭示了王阳明性格悲剧的深层原因。当弱小的正义力量与强大而残暴的皇权发生冲突时，悲剧的上演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这场戏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成为戏剧冲突的原型，起到了震撼观众心灵的审美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奇人物的壮举往往是由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王阳明在“反阉党”斗争大是大非面前的思考、抉择，以及处境，预示了人物的命运轨迹。

《王》剧设置“杖刑”这场戏，其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历史剧忠奸斗争的叙事模式，揭示了德性才是人物行为的主宰。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下，作为士大夫选择苟且偷生还是坚持大义；选择恪守传统礼仪孝道、保全家族的利益，还是坚守正义立场？王阳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是什么力量支配王阳明的选择呢？无疑是“良知”的驱使。“廷杖”这场戏在于告诉世人：封建专制王朝靠“廷杖”、靠“诏狱”对所谓有“异端”倾向的士人进行人身惩罚，是不可能维护专制统治的，相反促使更多的士人觉醒，加剧封建王朝走向崩溃，这恐怕是这场戏的寓意所在。士可杀不可辱，“廷杖”也宣告了

王阳明意识中“美人”情结的破灭。

如果说“廷杖”这场戏是对涉世未深的王阳明德性的初步考验，那么“厚葬娄妃”这场戏就是对王阳明德性进一步地检验。

“厚葬娄妃”这场戏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对主人公性格的展示提供了多角度的观察点。正德十四年（1519），时王阳明年四十八岁。六月，王阳明奉命赴福州三卫处置叛军问题，途经江西丰城，据丰城知县顾佖报告，始知南昌宁王朱宸濠为篡夺皇位，假传太后密旨，举兵叛乱。面对突如其来的宗室藩王叛乱，作为另负使命的官员王阳明作何选择，无疑是极大的难题。出于良知的驱使，王阳明毅然决定召集地方军队平息这场来势汹汹的叛乱，以维护社稷安定和百姓免遭战火之难。在王阳明英明果断地指挥下，仅用三十五天时间，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叛乱很快被平息，地方秩序得到恢复。《王》剧以这一史实为背景，设计了“厚葬娄妃”这场戏，以凸显王阳明的品格。娄妃是宁王朱宸濠的妻子，是王阳明在广信（今江西上饶）的老师娄谅之女，这一史实在《王阳明年谱》等文献中均有记载。但王阳明在平朱宸濠叛乱胜利后“厚祭娄妃”于史实无据，是虚构的故事。

剧中，王阳明明知“厚祭娄妃”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很可能被奸党诬陷，导致丢官、坐牢、杀头。王阳明没有听从部属的一再劝告，置个人与家族的利益而不顾，通过“厚葬”这一形式，为无辜且具正义感的娄妃昭雪。编导采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表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良知”境界。祭奠娄妃的场面，以滚滚赣江水为背景，表达了王阳明起伏的感情。高高的挽联、洁白的素花，象征娄妃高洁的品格；冉冉升起的祭奠花圈，如一轮皓月，象征娄妃心灵的美好与永恒。王阳明手捧白绢，阴阳之间的互唱，将全局推向高潮：

娄 妃（唱）：最不幸，选入王府作妃子，哪有民间多自由。

最可悲，夫君野心日日炽，欲图江山起阴谋。

我也曾，苦苦地劝，谆谆地诱，采樵图上诗句留。

我也曾重重地谏，狠狠地咒，反遭宁王

囚禁杏花楼。

为一介弱女子,何处去诉?何处去求?

王阳明(唱):师妹大义昭天下,一身气节照千秋。

一盘“枣梨”将我救,平叛有你功一筹;  
今日我,重殓厚葬送你走,还你一个,清白之身到天尽头!<sup>[1]</sup>

娄妃的唱词凄切、悲凉,王阳明的唱词则气势雄浑、声情浩荡。音乐设计高亢回荡,与王阳明的精神气质相融合,具有强烈的抒情风格。作为历史剧,这场戏的设计并非可有可无,其深刻的寓意在于封建专制王朝不仅剥夺百姓的人身权利,而且皇帝本人掌控着众多的女性,连分封在各地的藩王也同样具有这一特权,仅仅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娄妃本来自民间,是藩王的特权把她选入宁王府,她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入府后,她发现宁王有反叛之心,曾极力劝阻宁王不要走这一步,但宁王不听。宁王兵败,娄妃投江自尽,这是有史实可证的。娄妃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中众多善良女性的悲剧。王阳明为娄妃昭雪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还娄妃以清白,而在于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标榜“以德治天下”的道德虚伪性,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是制造女性悲剧、以及一切冤假错案的总根子。作为有德性的士大夫,敢于直面封建专制道德的虚伪和罪恶,为天下遭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毫无疑问,“厚葬娄妃”这场戏显示了德性的力量,其思想价值远远超出了戏的本身。

## 二

王阳明从小志向远大,立志“成圣贤”。进入仕途后,恪守诚心,敢担道义,为官清正。尤其是在经历了正德初年那场“反阉党”斗争,对封建专制王朝有了清醒地认识。正因为王阳明处事必以“良知”为准则,凡是对社稷、对百姓有利的事总是迎难而上;反之,决不随波逐流。王阳明一生的“事功”主要反映在“平乱”上。一是明正德年间指挥了平南、赣、汀、漳边界山民、强盗的作乱,二是正德年间平定南昌藩王朱宸濠叛乱,三是明嘉靖年间指挥了平两广边界山民、强盗的作乱。《王》剧的第二个层面是表现王阳明的立功伟业,通过“平民乱义收强盗王巴龙”和“平藩王朱宸濠”两个篇章展开:

明正德年间,阉党专政,朝纲废弛,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导致南方四省山区土民动乱,众多土匪强盗趁机蜂拥而起,占山为王,烧杀抢掠,危及地方安宁和朝廷统治。正德十一年(1516),时王阳明四十五岁。朝廷任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在平乱期间,王阳明组织、指挥了著名的“三次战役”,即“漳南之战”“横水桶冈之战”和“征三泷之战”。王阳明自正德十二年一月至正德十三年三月,仅用一年多时间,南方四省边界地区的动乱和匪患得以全部平息,王阳明的军事奇才和治理地方的魄力得到了全面展示。在平乱中,王阳明采用“攻心为上”,“破心中贼”,剿抚并举,以抚为主,保一方平安的策略。剧中,设置了良知尚未泯灭的强盗王巴龙这一人物。巴龙竟为三十两银子充当刘瑾的杀手,在贵州龙场,欲杀谪官王阳明,结果反被王阳明抓获。剧中,王阳明对这样一个贪图小利甘为杀手的小人,通过“巴龙脱裤”这一戏剧性的情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良知”启发人心:

王阳明:把内裤也脱了!

巴龙:这个不能脱!

王阳明:为什么不脱?

巴龙:父母留下的根种,岂可见人,好汉可杀不可辱!

王阳明:(大笑)哈哈哈哈哈。原来你也知道羞耻。<sup>[1]</sup>

这一情节,诙谐幽默,王阳明发现巴龙尚存“羞耻”之心,还是可化之人。但在如何处理巴龙的问题上,王阳明与属官罗岩发生了冲突:

罗岩:先生有所不知,凡抓到这等坏人,格杀毋论,这是王法!

王阳明:罗大人,天下强盗窃贼,能杀得完吗?

罗岩:那怎么办?

王阳明:重在教化,改恶从善,破心中之贼!<sup>[1]</sup>

未料,巴龙借机脱逃,入山当了强盗王。即便如此,王阳明也没有放弃拯救巴龙灵魂的努力。随着情节的发展,王阳明在平乱中又捕获了巴龙。王阳明通过对强盗王巴龙母的悉心照顾,以此感化巴龙,甚至连称巴龙母为“娘”,其仁义之举完全出乎巴龙的意料。后巴龙“良知”

发现，去恶为善，归顺王阳明，在平朱宸濠战斗中立功。王阳明在平乱过程中，并不是单纯地采用军事手段，而是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王阳明治理地方以仁爱为怀，免租免役，搞活流通，发展生产，举办学校，推行教化，宽刑息讼，从而缓解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争取了民心。同时，在边远山区增设县衙，保障百姓安居乐业。由于王阳明采用了正确的平乱策略，以人情伦理感化山中之贼，妥善处理了南赣等地动乱，安定了社会，深受百姓的拥戴。王阳明在结束平乱战事离任后，当地民众纷纷建“报功祠”以示感恩。

“平民乱义收强盗王巴龙”这场戏，其深刻的寓意，在于揭示了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在处理社会动乱问题上的重要作用。王阳明将平乱与教化百姓相结合，其为军为政目的不是为邀一己之功，而是将建功立业落实在“济世安民”之上。即便对那些“良知遮蔽者”，王阳明也十分注意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良知”，说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具有强烈的平民化倾向和普世性，绝非空洞的心性之论。

如果说王阳明平南赣等地之乱，是其建立军功之始；那么王阳明一生中最大的军功莫过于平“朱宸濠叛乱”。

“平宸濠叛乱”是《王》剧的重头戏。剧中，主要通过主人公在战前、战中和战后的表演，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叱咤风云的帅才形象。战前，王阳明得到密报，借祝寿为名，深入王府探明虚实。通过智斗、书斋询情等情节，在师妹娄妃的暗示下逃离了虎口，为赢得平叛胜利争取了时间。战中，王阳明设计假传“兵部咨文”以迷惑朱宸濠，延误其出兵时机，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在朱宸濠率兵围攻安庆之际，王阳明力排众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率军强攻南昌城，迫使朱宸濠回兵南昌，以挫败宸濠攻南、北两京的图谋。在朱宸濠回军时，王阳明又设伏兵于鄱阳湖上，用火攻一举击溃叛军，朱宸濠被生俘。鄱阳湖之战，王阳明运筹帷幄，以弱胜强，展现了指挥若定的大帅风范。编导并没有着意通过战役打斗场面以制造所谓“戏剧冲突”，而主要通过王阳明与宁王及其爪牙之间的斗智斗法揭示平乱之所以能够取胜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因素。战后，王阳明又与奸党集团展开了艰难曲折的斗

争。在与奸党的斗争中，尽管王阳明数陷困境，但王阳明做到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最后凭借其超人的智慧和意志转危为安。剧中，王阳明深谋远虑、临危不惧的性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正因为王阳明平朱宸濠叛乱的功绩，所以王阳明被授予“新建伯”爵位。

王阳明“平宸濠叛乱”这场戏，从战事的性质看，具有正义性，其结果避免了国家的动乱，百姓免遭战火之祸。剧中，不仅塑造了王阳明作为有明一代军事天才的形象，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南昌叛王朱宸濠与朝中奸党狼狈为奸，为达到做皇帝的目的，置社稷和百姓的安危而不顾的罪恶。剧中，宁王有一句台词，发人深省：“我也是，开国太祖的亲子孙，为何不能穿龙袍？”<sup>[1]</sup>由此可见，封建专制王朝的腐朽政治是导致宗室成员动乱的深层次原因，暴露了明王朝上自皇帝、下至贪官污吏“人欲”泛滥，“良知”沦丧的社会现实。

《王》剧反映王阳明“平两广”战事，则通过“画外音”作了介绍：“王阳明此番出征，改征为抚，未动一刀一箭，平定连年不息的动乱，稳定了西南边陲。但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病殁于凯程舟中，时年五十七岁。”<sup>[1]</sup>王阳明此功，朝野为之震动。尽管《明史·王守仁传》对王阳明的军事才华有高度的评价：“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sup>[2]1063</sup>但对王阳明来说，其一生所立军功，并没有给他及其家族带来实际的荣耀，而只是给他本人带来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冤屈，连同他的家族为此蒙羞。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封建专制王朝必亡的历史规律，《王》剧的寓意显然是深刻的。

### 三

一般而言，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只有当封建王朝政治黑暗，士人生存环境恶劣又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时，才会选择著书立说做学问，以寻求精神自由，实现自我超脱。因此，在一般士人的心态中，立德为上，其次立功，立言则是无奈之举。《王》剧在第三个层面塑造了一位思想探索者的形象，主要通过“格竹悟理”、“龙场悟道”和余姚龙泉山“中天阁讲学”这几场戏加以展示。

“格竹悟理”是王阳明年轻时质疑程朱理学

的一则故事,《王》剧则用来反映王阳明年轻时即具有叛道离经的性格。《王》剧一开始,就以“格竹悟理”开场。书生王阳明一袭白衣衫,端坐,神思凝定,专注“格竹”。舞台背景为青山竹林,动态的竹林表示王阳明思绪的流动。王阳明经过几天“格竹”,竟没有格出什么“理”来,于是对朱熹“一草一木皆含至理”的教条表示质疑。妻子诸氏婉言提醒:“朱子之学乃当今国学,岂能相背”。<sup>[1]</sup>王阳明几经思索后,大胆地喊出了“人是一定要讲真话的”心声,为全剧定下了基调,也为阳明的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

王阳明在正德初年“反阉党”斗争失败后,被贬谪到贵州修文龙场当驿丞。从意气风发的京官到不入流的谪官,从繁华的京城到偏远的瘴疠之地,王阳明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在龙场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王阳明开始反思程朱理学的合理性。剧中,古怪的王阳明为自己营建了石棺,躺在石棺中体悟“生死之道”。经过三天三夜的体悟,终于悟出了“格物致知”的新意,“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sup>[3][1228]</sup>在龙场炼狱中,王阳明经过生死体验,认识到程朱理学是靠不住的,思想体系僵化,学术支离不明,难以拯救士人的心灵,对社稷百姓更没有实用的价值。逆境成就了王阳明思想的飞跃。“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学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从此,王阳明从被动地适应环境,转化为主动影响和改造环境,从凄凉的生存处境转向从容自然地面对生活,重构了生命模式,重塑了自我精神。据《王阳明年谱》载:“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以所居湫湿,乃伐木构龙冈书院及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以居之。”<sup>[3][1228]</sup>王阳明通过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沟通交流,教土著搭建住房,改善生活环境。并通过创建龙冈书院,影响和教化当地百姓,贵州自此有了对土著的教育。王阳明通过立教,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关怀百姓,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龙场悟道”使得王阳明超越了生死之念,摆脱了自然环境的压迫,形成了以自我价值为标准的人生态度,由效法天理转化为开启自身的良知,心灵进入纯净的“万物一体”境界之中,真正确立了独立的文化人格。这种内省型和实践型

相结合的治学特点,形成了阳明心学的特色。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余姚龙泉山中天阁开展讲学活动,完成了从笃信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到创立“致良知”学说的转型。《王》剧末场戏“中天阁讲学”,王阳明接受余姚“七十四”位弟子的拜师礼,并对余姚弟子传授心学要义。王阳明在余姚的弟子可以说代表了其分布于全国的众多弟子,足见王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在王阳明的弟子中,就身份而言,有朝官和地方官,且有的弟子在官阶上要高于王阳明;但绝大多数则是普通学子,还有大量的平民百姓。这充分体现了王阳明“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以学术启迪世人的良苦用心。剧中,当同邑高足弟子钱德洪呈上刚刊印的王阳明心学著作《传习录》时,阳明惊喜地接受了这本承载着几十年思想探索的书籍。至此,《王》剧完成了王阳明这位心学集大成者形象的塑造。阳明心学的崛起,直接引发了中晚明倡导个性解放、心灵自由的社会思潮,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王阳明的心学既肯定了人作为“天地之心”的主体性,又确立了“致良知”的道德实践性,表现了王阳明对历史的反思精神和其学说的普世精神,尤其是为士人群体摆脱精神困境开辟了一条新的自立之路。

**结语** 以姚剧的形式表现一代心学大师“真三不朽”的人物形象,从三个层面演绎王阳明的传奇人生,堪属首创。清代大学者王士禛评王阳明:“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sup>[4][64]</sup>在王阳明的故里余姚龙泉山南麓建有“四先贤”碑亭,其中“明先贤王阳明故里”碑亭的亭额为:“真三不朽”,此语高度地概括了王阳明一生的千秋伟业,其语言的焦点在于一个“真”字。王阳明身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来世的“三不朽”,<sup>①</sup>但他以毕生精力实践了“致良知”,赋予了“三不朽”新的内涵:以“成圣贤”立志,以“良知”立行,以“致良知”弘道,其“真三不朽”的道德形象堪为后世之楷模。《王》剧以特有的视角,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贯通起来,重新诠释了王阳明“真三不朽”的普世精神,这也是《王》剧之所以能被大众所乐意接受的思想基础。作为新编历史剧,《王》剧是建立在足够的史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其人物形象才具有了可

信度和人格魅力,才具有了美学上悲壮、崇高的意义,历史寓意才有了思想的穿透性。当然,艺术创造是无止境的,《王》剧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方面可以深化之处还不少,尤其在主人公的语言方面可打造之处应该说还是有较大空间的。

**注释:**

①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语,出自《左传·襄公廿四年》。载鲁臣叔孙豹答晋臣范宣子问何谓“死而不朽”。曰:“太上有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19页。

**参考文献**

- [1] 杨东标,张金海.王阳明[J].中国剧本,2009(1):13-25.
- [2] 高占祥.明史:下[M]/高占祥.二十五史:卷十三,北京:线装书局,2007.
- [3]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4] 王士禛.池北偶谈[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Wang Yangming in the Yao Opera Wang Yangming

HUA Jian-xin

(Yuyao Institute, Ningbo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Yuyao 315401, China)

**Abstract:** The Yao Opera Wang Yangming creates a sage with three true virtues out of Wang Yangming, a philosopher of the Ming Dynasty, who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Yao Opera Wang Yangming is a complete display of the life of the character and his perfect personality. Therefore, the opera is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its humanistic and historical value.

**Keywords:** Yao Opera; Wang Yangming; three true virtues; character

(责任编辑 张文鸯)